

论解构主义的哲学与文学观及其影响

王钟陵

内容提要 作为后现代哲学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德里达在 1968 年“五月风暴”前即已批评、质疑结构主义，就已经有着明确的非中心化的思想，由此，他发展出了另一种表述方式：以异质性为中心，而以“他者”与“延异”这两个概念纵横交织出了解构思想。然而，在其晚年，他又与“他者”与“延异”这两个概念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德里达的文学观有五个要点：文学具有讲述一切的自由；文学应浓缩历史，包容一切；对“延异”概念内涵作了重要调整的阅读法；否认文学性；作品是一种建制，它形成自己的读者。解构思想在美国形成了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这一批评以颠覆文本与批评者的确定性为其特点与目标，而其结果则是解析变成了瘫痪。黑人文学批评与女性文学批评都受到了解构主义的影响，其实际作用是解构了从差异中形成却又凝固起来的那个统一的黑人或女人主体概念。这是解构主义批评观的一种特定的体现。虽然揭示事物及其概念内部复杂的异质性、流动性是重要的，但一定程度地承认其统一性与稳定性也不可缺少。

关键词 解构思想 德里达的文学观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 黑人文学批评 女性文学批评

王钟陵，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215

—

虽然“解构”一词早已弥漫中国社会，但一般人仅就词面作解，学界对于德里达解构哲学思想的兴起、内涵及变化，亦尚缺乏较为全面的、通贯其一生的研究，而解构主义文学观则更是罕见论及。

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典型，它代表了 1968 年五月风暴后法国以及西方思想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德里达思想的起源，如同福柯一样，也植根于他的幼年及年轻时代的经历与感受。

德里达 1930 年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出生后两个月，全家搬到了阿尔及利亚境内”^[1]。阿尔及利亚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但当年的主导语言是法语。在德占时期，法国政府贯彻排犹政策，1940 年，废除了允许本地犹太人取得法国公民身份的 1870 年 10 月 24 日颁布的克里米修斯法令^[2]，德里达等人于是失去了法国国籍，却又没有其它国籍。德里达后来说：“一个所谓种族或宗教的团体某天被国家剥夺了它的公民权。这个国家以单方决定的残暴手段没收了公民权，从不问人民的意愿，也没有赋予这些团体

论孙康宜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多重意义

朱巧云

内容提要 美籍华人女学者孙康宜在中国古典诗词、比较诗学等方面成果颇多。本文在分析孙康宜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其研究有着多重的意义:一是有益于当代学界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二是促进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作品在当代的经典化进程和海外传播;三是丰富了中国诗论,对深入开拓美国汉学性别研究亦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孙康宜 女性文学研究 多重意义

朱巧云,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 510632

孙康宜是美国汉学界有名的华人女学者,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其研究涉及中国古典诗词、比较诗学、文化美学等多个领域,出版中英文学术专著多种,如《词与文类研究》、《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等,还有中英文论文200多篇。近几年来,学界对孙康宜的研究关注渐多,目前已有关十几篇论文讨论了孙康宜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但对孙康宜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评论还不是很多。赵文君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美国学者孙康宜之明清女性文学研究》梳理了孙康宜的明清女性文学研究,并从“男女双性”的诗学理想、文学史与社会史对话的角度评述了孙康宜明清女性文学研究的价值。本文则从中西方诗学、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和海外传播等角度分析孙康宜中国古代女性文学

研究的学术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末,孙康宜有感于北美明清诗歌研究的薄弱,意欲弥补之。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触动下,她撰写了《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并对柳如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又涉足到西方汉学界少有人问津的性别研究领域,撰写了数十篇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女性文学、诗学的中英文论文,发表于美国、大陆、台湾的一些杂志期刊,或收录在各类会议论文集和《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文学的声音》、《文学经典的挑战》等著作中。

对中国古代女性作家尤其是明清女作家的成就,孙康宜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选取几个角度切入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11&ZD111)及暨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宁静致远”工程项目“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转型”的阶段性成果。

中产阶级的“利基”杂志 与美国文学的温床

——《纽约客》综述

叶 子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介绍《纽约客》的总体风格与容量,给予数据统计的同时,介绍杂志的主要版块设置与态度立场,并大致梳理杂志中与美国文学相关的重大事件,来说明《纽约客》作为一本中产阶级的“利基”杂志,如何成为美国文学最理想的中介平台。

关键词 《纽约客》 利基杂志 美国文学

叶 子,复旦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系博士生 200433



1925 年 2 月 21 日,《纽约客》创刊号的封面。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又译《纽约人》)是一本集合了报道、评论、随笔、小说、诗歌与漫画的美国文化类新闻杂志。1925 年 2 月 21 日,第一期《纽约客》杂志由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 1892—1951)在纽约创刊。之后以每年 42 期周刊,5 期双周刊的速度发行。

一、一本中产阶级的“利基”杂志

在美国偏重文化的主流新闻杂志中,有较为符合大众趣味的一类,比如《时代周刊》(Time)和《新闻周刊》(Newsweek);也有相对小众,被称为“利基杂志”(Niche Magazine)的一类,比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哈泼氏》(Harper's)和《纽约客》。

“利基”是商业用语,与“大众”(mass)相对,常见于“利基市场”,“利基营销”等。“利基杂志”的特点,在于利用本身的专长与优势,瞄准某一类型的读者市场。它们是极有针对性,专业性极强的媒体。大众

对象、方法与视角： 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赵普光

内容提要 书话是百年中国文学中一个具有庞大创作群体和丰富创作实绩的存在；书话作为文化现象，是一个有着悠久写作历史渊源的写作实践的存在。无论作为研究途径，还是作为研究对象，书话在此前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极少有人涉及，遑论系统深入梳理。本文指出书话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以边缘的书话文体为途径去探究现代中国文学的诸种问题，是极佳的途径；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将书话放置在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意义重大。

关键词 书话 书话文体 现代中国文学 对象 途径

赵普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210097

引言

本文论题“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指出了两个问题：一方面，以边缘的书话文体为途径去探究现代中国文学的诸种问题；一方面，将书话放置在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无论作为研究途径，还是作为研究对象，书话在此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少有人系统深入研究。

书话之所以是崭新的课题，一是因为书话是一个边缘的存在，这种边缘性文体必然要招致很多不屑的目光，处于被研究者遗忘的角落；一是源于书话文体本身的庞杂繁复。这种庞杂不仅使研究者无法为其归类，难以把握其文体本质特性，如同面对一个

缩成一团的刺猬，尽管知道里面“营养”丰富，但却不知从哪里入手。然而，事实上，这种庞杂却正是它的价值所在，特点所在。在这个领域里有着更多的内容，有着复杂的关系，从而使得书话成为折射现代中国文学、文化、文人等复杂的网络的一个侧面。要清理这个复杂的网络，从书话文体入手，不失为一种颇佳的选择。

书话何谓？对“书”的感悟、品评，或在此基础上生发开来谈及与书相关的人物故实掌故，抒发社会历史人生的种种况味，用富有文学性的手法将这些感受、议论表达出来的文字，叫书话。这里对书的感悟和品评可以包括对书的内容、艺术以及书的装帧、历史变迁等诸多谈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 10CZW063)、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编号 09YJC751046)、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编号 2012M511710)的阶段成果之一。

论布衣文人对清代文学的推动

张 琼

内容提要 清代布衣文人为清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影响了清代诗、词、文创作风气的转移;如孙枝蔚、吴之振、厉鹗促成了清代诗坛宗唐与宗宋的对立,万树、孙默引领了词坛风气,刘大櫆完善了桐城派理论。布衣文人也促进了清代各种文体的全面繁荣,尤其在小说与戏剧创作方面,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此外,布衣文人更能体会百姓的痛苦哀怨与希翼企盼,助推了平民文学的大发展。布衣文人成就的取得,与他们摆脱了皇权施加于文学的影响并以文学创作为终生追求有直接的关系,清代文学正因为布衣的创作而得以丰富充实。

主题词 清代文学 布衣文人 小说戏剧 平民文学

张 琼,广东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510320

清代布衣文人数量十分庞大,笔者根据柯愈春先生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做过统计,在此书收录的 19700 名文人中,布衣文人有 10761 位,占据了文人总数的一半有余,数量相当可观。这些文人从主流的道路上剥离出来,构成了与仕宦文人并行的客观存在,并以其对创作的执着投入,为清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学术界,对于布衣文人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不过,这种关注仅限于个案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清代布衣文人在清代文学史上地位进行全面观照的成果出现。笔者不揣浅陋,就此展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影响清代文坛风气转移

不可否认,在文坛上,仕宦文人具备地位的优

势,登高一呼应者如響,甚至能够形成席卷全国的文学运动,这在文学史上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如赵执信《钝吟集序》所言:“文章者,载道与治之器,而非人则莫之任也。三代以上惟君相操之,春秋作而权在匹夫,盖千古之变端矣。汉、唐而降,朝野相参,而卿大夫之力恒胜其上者,经术事功足以震耀海内,故一言之发,举世诵之。即其仅以立言自见者类,学富而名高,不挟官位以为重其光芒气焰,能使天下人之心思耳目无敢苟为异同。岂若幽潜之士,老为蠹鱼,或瑰词自赏,或寓言托讽,幸则知名于时,不幸则与身俱没,漠无关于文章之数,可胜道哉!”^[1]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等,都是如此。他们在文坛呼风唤雨,引领着一时潮流。而布衣身处下层,憔悴偃蹇,生存尚且不易,其作品的流传

本文系教育部 2008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8JC751008)阶段性成果。